

# 薛暮桥文集

## 第十四卷

# 薛暮桥文集

第十四卷

(1990—1999)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 × 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 目 录

## 第十四卷

缅怀革命的农学家吴觉农同志 (1990年1月) .....	1
就深化改革和加强咨询机构工作问题给马洪的信 (1990年2月) .....	7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统盘考虑 ——就“八五”计划给马洪的一封信 (1990年3月) .....	11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1990年5月) .....	13
再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 ——给国家计委的一封信 (1990年5月) .....	19
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回顾 (1990年5月) .....	24
给杨欢进的三封信 (1990年6月、7月、9月) .....	35
给玉祁乡政府的信 (1990年8月) .....	46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言 (1990年8月) .....	48

怀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 (1990年9月)	63
就孔子思想给谷牧的信 (1990年9月)	69
深化改革 摆脱困境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1990年9月)	71
从保护转向竞争 (1990年11月)	79
理顺物价 平整市场 深化改革 (1990年12月)	83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1990年12月)	89
回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十年 (1990年)	108
为《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写的约稿信 (1990年)	115
关于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1991年1月)	116
管住货币 放开物价 (1991年1月)	122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 (1991年6月)	125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序 (1991年12月)	134
革命艰险岁月中的挚友 ——缅怀孙晓邨同志 (1992年5月)	138
缅怀先念同志对物价工作的领导 (1992年7月)	143

---

怀念卓越的经济工作者李富春同志 (1992年7月) .....	148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1992年9月) .....	152
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1992年) .....	160
怀念冶方 (1993年1月) .....	196
继往开来 迎接胜利 ——《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代序 (1996年4月) .....	200
解放战争时期(1947—1949年) 财政经济工作的回忆 (1996年4月) .....	205
《薛暮桥晚年文稿》后记 (1999年3月) .....	220

# 缅怀革命的农学家吴觉农同志\*

(1990年1月)

我国著名的农学家吴觉农<sup>①</sup>同志于1989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我们同他相处60多年，缅怀他的事迹，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共事的岁月，深感他的一生是为民族振兴和祖国富强奋斗不息的一生。对他的去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

## 在振兴茶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觉农同志生于19世纪末年，由于看到清末民初政府腐败、列强侵袭、生产落后、民不聊生，因而立志振兴农业，以农立国，故取名“觉农”。他的家乡是浙江上虞，农民多以产茶为主要副业。在历史上，茶叶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华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逐年衰落，有鉴于此，他在农业中更专注于茶叶。

觉农同志毕业于浙江农专（浙农大前身），1919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几年中他参考了各国茶叶资料，撰写了《中国茶叶改革方针》等颇有见地的论文。1922年回国后，他当过农专教员，办过浙江省的合作事业，经管过上海市的园林场，有时还靠卖稿为生。1931年，他被邀负责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出口检验，从此同茶叶结下不解缘。在解放前的漫长年代，他带动一批志同道合的茶叶工作者，为振兴茶业开辟新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一、改进茶叶的产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以恢复华茶国际声誉；二、采取措施扩大外贸，他建议成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国营茶叶公司，限制洋商、茶栈对茶农的中间

---

\* 本文作者为陈翰笙、孙晓邨、薛暮桥、冯和法、秦柳方，原载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

① 吴觉农（1897—1989），浙江上虞人。社会活动家，农学家，茶叶专家。——编者注

盘剥，以提高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三、注重科研和培育专业人才，1940年，经觉农同志提议，在复旦大学创设了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的学生成为全国茶叶专业队伍的骨干力量；1941年他在出产名茶的福建武夷山麓创立第一所全国规模的茶叶研究所，亲任所长，开展了对茶叶的全面科学研究。

可是，任何想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努力，在旧中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和打击。觉农同志在实施统购统销计划时，损害了洋行买办和地方豪绅的利益，因而黑势力对他进行威胁和恫吓；国民党高层也视他为“异端”，他时常受到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掣肘和排挤，经管茶叶的公司和机构演变成为官僚资本争权夺利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觉农同志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他才得以施展抱负。建国初期，在党的方针指导下，经他和一些同志精心筹划，在全国建立了布局完整的茶叶产销体系，创设各种类型的机制茶厂，大力发展外销，增设和扩大高等院校的茶叶科系和科研机构，使茶叶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欠款，相当一部分是用茶叶偿还的。六七十年代，我国茶叶生产受僵化体制的束缚，加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动乱，茶叶产销混乱，发展迟缓。粉碎“四人帮”后，觉农同志深信前途有望，虽届八十高龄，仍深入实际，不断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出有关管理体制、增加创汇和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发展红茶等建议。

觉农同志毕生亲自从事茶叶科学和史料的研究，发表了丰富的论著，直到晚年仍笔耕不辍，他的著作充实了祖国农业的历史文库。觉农同志生前是中国茶叶学会的名誉理事长，由于他对茶叶事业的理论、实践及所作贡献，中国的茶叶工作者无不推崇他为茶界的一代宗师和“茶圣”。

### 为科学、为进步、为人民无私奉献

在我们同觉农同志相处中，都会感到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富于开拓精神。他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敢于创业，不畏艰险；他待人



热诚，心怀率真，发现自己有不足或看法片面，也勇于改正。因此，在二三十年代，想为科学文化或社会进步事业做些有益工作的人，都愿和他交往和合作。20年代，他同章锡琛、胡愈之等同志以薪金和稿费白手起家开创“开明书店”，这个在新思潮激荡中应运而生的书店，得到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十年之内，“开明”发展成为几乎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大书店，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时期，觉农同志还把很多精力放在两个与“农”有关的学术团体上。一个是在海内外负有盛誉的“中华农学会”，它荟萃了农学界知名的前辈和农林渔畜各科的后起之秀。觉农同志当时任农学会总干事，因缺少经费，办公地点一度设在他简朴的家里。学会出版刊物，召开年会，成为农学界交流学术、沟通情况的中心。抗战期间在重庆，觉农同志配合梁希同志推动学会工作，团结和影响了一批农业科学工作者。解放后，成立“中国农学会”，觉农同志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他逝世前，是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

觉农同志积极参加的另一个学术团体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30年代初，陈翰笙同志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从事广泛的农村调查并发表论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与打击，进步青年被“开除”，翰笙同志也愤而去职。此后，以这批同志为基本力量，邀请农村经济学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起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冬成立，第二年组织扩大，选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日常工作负责人是薛暮桥，会内建立了党的秘密领导小组。回顾当时，主要成员如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等很多同志已经去世，现尚健在的除本文的作者外，还有骆耕漠、徐雪寒、陈洪进、吴大琨等同志。研究会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开展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经觉农、晓邨同志奔走，刊物才得以登记发行。《中国农村》发表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阐明党在六大提出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论点，与托派进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评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等；研究会响应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

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农村工作者。这些活动都得到觉农同志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所谓《告国人书》，指责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共产党的“化身”，救国会以公开信的形式反击并秘密散发。《中国农村》接受我党文委的指示，在第二卷第三期上将信公开发表。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即勒令《中国农村》停刊。在这危急关头，觉农同志挺身而出，以他农业专家的身份和声望，向市党部部长潘公展力争，刊物才得以复刊。这时期，研究会受到各种迫害和麻烦，大多由觉农同志出面周旋而转危为安。在当时上海反动统治的文化高压下，许多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往往短期内就遭查禁，《中国农村》则顽强屹立，直至抗战胜利后，它还以《文汇报》副刊的形式出版，研究会维持到新中国诞生，在完成历史任务后才宣布解散。这是许多同志呕心沥血奋斗的结果，也与觉农同志的努力拼搏分不开。

## 与我党肝胆相照，六十年风雨同舟

觉农同志青年时代就具有较强的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的同乡、同学夏衍、胡愈之、杨贤江等对他早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从日本回国后，他在《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常发表文章，除了农业，还涉及妇女、社会、经济、文教等各种问题，他的观点有明显同情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倾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将他所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等文选为参考教材。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他同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在上海商报上发表公开信，对国民党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提出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周恩来同志称赞这一行动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创举”。在白色恐怖笼罩时期，他不顾自身安危，在家中掩护了刘鼎、吴先清等共产党人。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他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他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撰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等书刊，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和国

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当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南京救国会的孙晓邨、曹孟君也在当地被拘押，觉农同志和另几位同志四处奔走，曾亲到南京营救。

抗战时期，觉农同志在重庆参加了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同志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这是在国统区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任务是配合党在白区的工作，积极贯彻党的团结抗战方针，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和团结军政各界上层人士。觉农同志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主要同“小民革”的任务相联系。抗战胜利后，“小民革”重心移到上海，觉农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他和当时在上海、南京的“小民革”同志经常碰头，研究分析国民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动向，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工作方向，宣传党的政策；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接受党托办的事项，如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担任“现代经济通讯社”董事长，为党提供经济信息，参与“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需物资等。解放战争后期，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他协助不少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自己留在上海同金仲华、曹孟君等同志组成“小民革”国内工作委员会坚持工作，他同上海工商界、科技界保持密切关系，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其他聚餐会、座谈会等形式，宣传当时的形势，以扩大影响，稳住某些上层人士，使他们消除顾虑，增进认识，迎接解放。国民党统治濒临瓦解前，为防止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觉农同志曾接受党组织的托付，以他同汤恩伯“老同学”的关系，争取汤仿效傅作义将军的“北平方式”。由于情况复杂，这一试探未能成功。

1949年秋，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篇章。觉农同志来到北京，同许多共同战斗过的老友重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出席了开国大典，欢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以来四十年，他除担任过政府职务外，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和常委。第一届政协后，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觉农同志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不久被选为中央常委，对民建颇多建树。1988年夏，民建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觉农同志以年事恳辞，改任民建中央咨

议委员会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衷心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耄耋之年，仍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为推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竭尽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同党农同志风雨同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一生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就深化改革和加强咨询 机构工作问题给马洪的信\*

(1990年2月)

马洪<sup>①</sup>同志：

昨天读了你在全国咨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草稿），写得如此详尽，如此完善，深为欣喜。有两个问题提一点补充意见，供你参考。

（一）对治理整顿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对深化改革的意见，我觉得似乎还没有触及深层根源，没有指出改革的远景。远景不明，就可能又走弯路。

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指出了改革的远景，但仍模糊不清，在执行中发生重大失误，以致被迫再走一段回头路，治理整顿实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先调整，再改革，经过五年调整基本完成后，全力进行改革（这是对的）；但因只管微观放活，未管宏观管住，以致在宏观严重失控后，又被迫再来一次调整，即“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李鹏同志说，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创造先决条件，与我一年前所说是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深化改革，还要按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大会所提出的方向去做，要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以理顺价格为突破口，继续承认“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而不要企图在价格极端不合理的条件下能够深化改革。

赵紫阳同志不理解调整价格必须管住货币，放任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因而不得不走放开货币、管住价格的错误道路，使物价在快要理顺（1984年）后又严重扭曲。物价扭曲，企业就无法自主经营，自负盈

---

\* 此信中深化改革部分的内容曾收入《薛暮桥晚年文稿》。

① 马洪（1920—2007）：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编者注

亏，自由竞争，走上生动活泼的道路，于是用一个企业一个基数的包干制度来代替理顺价格，要想以此来创造自负盈亏、自由竞争的跑道，接着看到不理顺价格不能在平坦的跑道上自由竞争，又企图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加快物价改革步伐，结果发生提存抢购，迫得十三届三中全会不得不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和通货膨胀。

现在治理整顿获得初步效果，市场由全面紧俏变为部分紧俏，部分疲软。对于市场疲软产生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惊慌失措，急于放松货币，其结果是再来一次恶性循环，我们认为应当利用疲软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迫使疲软产品缩短战线，同时应当看到市场疲软是为理顺价格创造必要条件，应当不失时机有步骤地理顺价格，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企业的承包责任制是在价格扭曲条件下产生的，只有在理顺价格的条件下才能够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竞争，自己创造机遇和承担风险，放任价格永远扭曲，完善承包责任制是肯定达不到目的的。

除理顺价格外，建立主要利用经济办法进行宏观调控的体制，这是深化改革的根本出路。调控手段主要是财政税收和银行信贷（货币发行政策）。目前财政逐级承包制最大的弊病是取消了税收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变成反调节，限制生产的高税产品抢着创办，奖励生产的免税低税产品不愿创办，我在张劲夫同志召开的会议中已经详讲。在这方面，深化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从承包制改为分税制，也可以先从所有高税产品的产品税直交中央开始。单纯完善承包制是不利于深化改革的。不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利用经济办法进行宏观调控的两条腿就缺了一条。

更重要的调控手段是银行信贷，一年来紧缩信贷使市场从全面紧俏变为部分疲软，可见这个调控手段是很有力量的。但这时候是疲软与紧俏并存，可见产业结构仍不合理，银行不能一叫就放，而应执行倾斜政策。紧缩政策能否继续执行，许多同志发生顾虑，因为我国还没有一套严格的金融管理制度，发行权不属于中央银行，而可以由决策人说了就做。1984年第四季度提出1985年的信贷基数以1984年的实发信贷总额为基数，引起银行送款上门，第四季度货币发行额比上年同季增加

146%，这一失误在1985年的人大全体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检讨。去年12月我又看到一个文件规定以1989年信贷额为1990年信贷额的基数，这个决定不知怎样作出来的。幸而时间不同，其他条件不同，未发生同样的信贷失控，但我还是为此担心。西德货币发行额要议会批准，我任人大常委时也有些人提出这个建议，我认为我国目前还做不到。但货币发行必须有严格的决策程序，不应当由一两个决策人来随意指挥中央银行。我们咨询机构对这问题应作研究，提出建议。

## （二）关于加强咨询机构工作问题。

今年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现在的发展研究中心是原中心的扩大和发展）十周年，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句话，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是1980年7月，在此以前早已开过几次会议，因档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保管（当时中心自己没有收发、会计、文件保管人员），所以何时开始尚待调查，总之说十年是可以的。利用这次会议讲讲十年经过，总结经验，是需要的。你的报告已经详细讲了，而且讲得很完全，缺点是你只知道后半段的情况，我只知道前半段的情况，恐怕两人都讲不完全。据我记忆，经济研究中心最有成效的时期是1983年前后，当时受国务院委托，与有关部门合作，提出了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等改革的建议，而且被国务院采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财政体制改革是从“分灶吃饭”改为“利改税”（即分税制），后来从“利改税”改为分级承包制不是我们提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中央银行，与当时四大银行分别开会（因为四行矛盾很大，一起开会争吵不休）最后提出方案。外贸体制改革是由外贸部要求，国务院委托经济研究中心帮助研究提出方案。物价问题与宋劭文主持的物价办经过多次讨论，其中棉布提价、化纤布降价的方案是经济研究中心提出来的，召开有关部门开会取得一致同意，还有许多较小问题的讨论记不清了。这几个问题都是由国务院委托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的，建议得到国务院的采纳，有关各部也积极参加研究，所以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1984年后，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意见得不到赵紫阳同志的赞同，提了意见不起作用，他也不来找我们了，所以中心的地位降落。扩大为现在的发展研究中心后，有几年我们的意见不被采纳，甚至受到批评，十三届三中全

会后才有转机。

随想随写，语无伦次，必要时可找几个人议论一下。

顺致

敬礼！

薛暮桥

2月21日



#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统盘考虑

——就“八五”计划给马洪的一封信

(1990年3月)

马洪同志：

前信提了一些零星意见，受到你们如此重视，深感意外。现在我已无精力参加中心的研究工作，只能就我看到的文件资料，想到一点就说一点，可能对你们的研究工作有些帮助。

上星期我看到国家计委《关于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设想工作的安排意见》，觉得大体上是好的。但对“三、深化改革面临的一些重要课题”认为安排不当，曾在旁边提了一些意见，恐怕不会引起注意，故特写信向你报告。

国家计委不是研究体制改革的机关，故把各方面的改革规划推给有关部门分别研究。但体制改革必须统盘考虑，才能有利于加强宏观控制，各想各的是不可能作出脉络贯通的整个体制改革规划的。本想写信给国家计委和体改委，恐无效果。知道中心也在研究“八五规划”，故向你报告，请注意这个问题，并在适当时提出意见。

计委文件这一节提了五个问题：

1. 企业改革。说“目前推行的企业承包制，国务院确定实行到1992年，1992年以后怎么办，请体改委组织研究，提出方案”。对这个问题，我在前信已经提了一点意见，认为不理顺物价来“完善承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张劲夫同志召开的会议中，我对承包制的批评，体改委是很不赞成的，希望中心对此问题多予注意。

2. 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包干制有利有弊，像现在这样层层包干，财力这样分散，国家很难办成几件大事”，所以请财政部提出方案，“怎样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我在前信已经说到，财政包干制的最大弊端，是取消了财政税收对宏观控制的调控作用，甚至